

# 跨出院线边界,不只是影视行业的“荒岛求生”

## ■玉渊杂谭

谢欣

2020年,受疫情“黑天鹅”影响,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影视行业被认为是受影响的灾区之一。《囡妈》《唐人街探案3》等电影纷纷撤档,本该是一年中最大爆发期的春节档,却显得格外冷清,经历了2019年“史上最强大国档”之后的影视行业,对2020年春节档的全情投入,迎来了当头一棒。

春节档的“滑铁卢”之后,各大剧组也面临停工。为抗击疫情、保证人员安全,各大影视基地以及已经开机的剧组纷纷发布停拍公告。由于涉及到场地、人员、设备等因素,影视停拍无疑于对片方经济实力进行了一次大考验。

可以说,疫情之下整个影视行业的线下产业已经处于停摆状态。

对于线上平台来说,疫情却并不完全是坏消息。居家隔离,闭门不出的防疫政策为线上平台带来了更多的观众。数据显

示:爱奇艺会员环比增长1079%,芒果TV会员环比增长708%,腾讯视频会员环比增长319%,各大视频平台日均在线时长均有所增长。已经上线的作品如《下一站是幸福》《绝代双骄》《新世界》等,也在疫情期间赢得了更高的关注和热度。

线上产业在疫情中的利好形式,也使得部分在疫情中损失惨重的线下产业,在看到了脱困希望的同时,进一步思考整个行业的求变与可能性——谁能跨出院线边界,谁就能在整个行业的停摆状态下“荒岛求生”。

1月24日,原定于春节档上映的电影《囡妈》宣布与字节跳动所属平台合作,大年初一全网免费独播。消息传来,观众们自然欢天喜地,免费欣赏电影,无聊的宅家生活多了一份乐趣,仅仅开播几天《囡妈》线上播放量就超过6亿,可谓数据喜人。借助线上播放,《囡妈》杀出了疫情的围困,线上播放的新形式也受到了广泛的讨论——院线电影与新媒体的联动,是否意味封闭影院模式的个性化、自由化“转场”?

这是一次《囡妈》个性化的实验,还是一声

电影产业全面革新的提示音?诸多业界人士对《囡妈》之举表现出的担忧,分明指向对整个电影产业未来“大银幕”与“小屏幕”如何瓜分蛋糕的观望。

思考这些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如何理解“新事物”对“传统事物”的冲击,冲击靶心与院线缺陷形成对应。《2019年第3季度中国短视频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第3季度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5.74亿,手机网民渗透率为66.9%。《2020全球数字报告》显示,全球手机用户数量为51.9亿,每个网民平均在线时间为6小时43分/天,其中看网络视频的受众占65%。数据示例表明,以互联网为“新事物”代表的诸多新媒体平台,展示出全球范围强劲的市场价值和传播能力。

从电影产业最为注重的市场角度来看,市场核心依然是为电影埋单的广大受众。院线本体与多媒体平台,已然为受众选择观影模式提供相对开放的、自由的主动权。院线与流媒体均具备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包括画质、震撼力、体验、感官刺激等诸多从视听心理到心理干涉的层次,人们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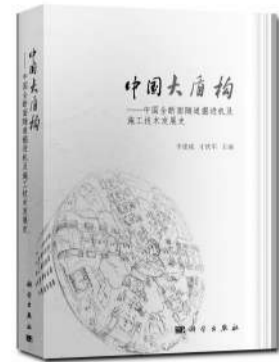
选择在电影院吃着爆米花体验《双子杀手》CG技术的逼真,也愿意在家借助电视、手机等终端独享“个人影院”的满足。这就形成了受众的“重叠”态:无所谓院线还是流媒体载体,院线电影还是网络电影形态,只要内容能够勾起好奇心,即可贡献票房和点击率。

疫情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是巨大的。但疫情也让电影业各环节有了难得的反思机会。对于院线来说,需要积极探索商业模式创新,单一地依赖新片上映的窗口期所得票房作为核心收入来源的好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因此,“蛋糕”被动了,只是一次对传统电影产业的提醒,疫情终将消散,但去核心化的多媒体市场发展趋向不可挡。做好内容、讲好故事,始终应当作为电影从业者关注的重中之重。对于诸多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介受众,院线应进行必要的身份自省,只有切实实现电影产业生态共同体的融合、交互与革新,才可能养成产业整体适应时代、社会发展规律与人民对电影不断增长新需求的良性发展路径。

# 《中国大盾构》: 绘制大国技术的雄关漫道

## ■字里行间

杨华勇



书名:中国大盾构  
作者:孙永福 钱七虎 杜彦良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月

国际水平。面对上述跨越百年、错综复杂的史实,《中国大盾构》一书进行了系统梳理,对世界盾构技术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回顾,有事实、有故事、有数据;将中国盾构技术发展历史清清楚楚地展示出来,有阶段、有图表、有分析。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盾构产业有明显的特殊性,那就是施工技术引领制造技术。《中国大盾构》一书对国内十几家从事盾构施工的央企国企及他们所施工的八十四项盾构重点工程,进行了深入的技术创新总结,对国内所有盾构重点工程进行了列表展示,所有重点工程图片都收入书中,既有资料性,又有总结分析性,十分难得。

《中国大盾构》对中国铁装备等几家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研发、产业化进程等,都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梳理和分析,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它还对标“走出去”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整理。

在《中国大盾构》中我们看到,中国盾构的“系统批发”“打包出口”让中国大型装备以“中国品牌”“中国标准”的形象“走出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2020年1月,科学出版社推出了由三位资深中国工程院院士孙永福、钱七虎、杜彦良作序,内含90多万字、300多张图片的巨著《中国大盾构——中国全断面隧道掘进机及施工技术发展史》(李建斌、才铁军主编),看后令人振奋、欣慰。

时代呼唤一部既专业又科普,既片段又历史,既科学又文学的著作,《中国大盾构》基本满足了这些要求。这是一部优秀的技术专著;这是一部优秀的科普图书;这是一部优秀的纪实文学。

《中国大盾构》权威、全面,涵盖全产业链,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部盾构产业及施工技术发展史。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盾构/TBM)俗称盾构,被称为“工程机械之王”、“工程机械中的“航空母舰”。

世界盾构技术起源于1843年。中国的盾构产业起步于二十世纪50年代。2009年之后,经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盾构机实现了国产化,并且走出国门,出口到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18年底,国产盾构机的设计制造及掘进施工技术水平已达到,甚至在个别领域已超过了

书中的“时代风流人物”一章,分“科技精英”和“大国工匠”两节,记述了三十多名技术顶尖人才和二十多名技能型人才的不凡事迹,并配以精美的现场照片。这些人,几乎涵盖了盾构及施工的所有“大师”级别人物。其中有我国盾构及地下工程领域的领军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有李建斌、洪开荣、谭顺辉、刘飞香、程永亮、王杜娟、周文波、何川、杜立杰、张伯阳、周骏、张闲庆、王寿强等国内知名盾构专家,还有母永奇、李刚、王保利、彭桂梁、沈益敏、赵斌等大国工匠,其中多数人都曾荣登央视“大国工匠”栏目。

《中国大盾构》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既是专业的,又是科普的,专业性与可读性高度融合。它是一部复合型的历史著作,它集三重身份于一体,既是一部科学专著,又是一部科普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这种复合型,是由《中国大盾构》的定位和读者指向群体决定的。中国大盾构的发展史,必须是专业的;必须是科普的,是因为一部民族工业的振兴史,不能局限于工程技术人员的圈子里,要为广大读者接受;必须是文学的,是因为可读性、趣味性要强,90多万字的书,要让人能看、喜欢看,给人以文学的享受。

# 莱缪尔·W.瑟雷尔: 不该被历史遗忘的专利律师

## ■科学史话

武夷山

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和尼古拉·特斯拉(1856—1943)都是千古留名的大发明家。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俩的背后都有一位高水平的专利律师在提供法务支持,他就是莱缪尔·W.瑟雷尔。诸多科技史著作只记载着爱迪生和特斯拉的丰功伟绩,但几乎没人提瑟雷尔的贡献。直到现在,维基百科都没有设立瑟雷尔的词条。

《技术与文化》杂志2009年第3期发表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注册专利律师卡拉·W.斯旺森的文章——职业化专利从业人员的兴起。文章称,瑟雷尔是著名的专利经营者,爱迪生的一些重要专利,如电报、电话、唱片、电灯等,都是他来经营的。有人评论说,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是美国最专业的专利律师之一。可是,今人很少知道他的名字。另外,乔治·戴尔和理查德·戴尔父子都是专利律师。他们为爱迪生管理专利申请业务达几十年,参与了爱迪生发明致富业务的很多侧面。可是,今人很少听说过他们。斯旺森认为,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讲,这些专利律师也是发明史的一部分,但如今的科技史学者对他们的研究很不够。

通过斯旺森的一篇文章,笔者才头一回知道有瑟雷尔这个人。但是,在网上搜索瑟雷尔的信息,收获很小。现在我们只知道,瑟雷尔1829年生于英国伦敦,1899年逝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普兰菲尔德。他一共有10个兄弟姐妹。至于他的受教育状况、职业发展历程、社交网络等,都未查到相关信息。

1879年间,爱迪生写给美国专利局长的一封信大意如下:“新泽西州门罗公园的申请人托马斯·爱迪生请求为其电灯改进方面的发明和按照附件所列参数制造电灯的方法而获颁专利。爱迪生进一步请求,请认可纽约州纽约

的莱缪尔·W.瑟雷尔为其专利律师,赋予他在以下几方面的充分的替代权和撤销权:从事该项专利申请,对专利申请进行修改,接受专利,在专利局办理与此有关的所有业务。”

管中窥豹,由此可见爱迪生对瑟雷尔是充分信任的。

瑟雷尔帮助爱迪生处理过多项专利纠纷,他特别要求爱迪生收集相关证据。比如,1880年2月16日,瑟雷尔写信给爱迪生,信中说:“您能否劳驾找一位年轻人把您的那摞图纸(原始的思路草图)翻阅一遍,把与电话和声学技术相关的图纸挑出来,按照绘图日期排列。”瑟雷尔服务的对象不仅仅是爱迪生,还有特斯拉。弧光灯是特斯拉的重要发明。为进入弧光灯照明领域,1885年春,特斯拉准备了涵盖发电机、弧光灯和调节器改进的专利申请。虽然他的弧光灯和调节器跟查尔斯·布拉什与伊莱休·汤姆孙的发明类似,不过他的发电机包含了几项技术改进,能减少由发热和涡流造成的能量损耗。特斯拉找到了爱迪生在纽约的首席专利律师瑟雷尔,请他帮助申请这些专利。这是两人的首次合作。为此,特斯拉每月给瑟雷尔150美元的报酬。后来,瑟雷尔又帮特斯拉申请了交流电机专利。申请成功后,瑟雷尔为特斯拉与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谈成了一项双赢的专利许可协议,该协议授予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采用交流电机专利的独家权利,也让特斯拉获得了与交流电机产量挂钩的很不错的专利使用费。

综上所述,正因为有了瑟雷尔及其他专利律师的法务协助,爱迪生和特斯拉这样的大发明家才得以将其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自己最擅长的发明创造。到现在为止,科技史未能对专利律师的作用和历史贡献给予应有的笔墨是令人遗憾的。充分承认专利律师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把科技史写得更完整、更准确。从技术发明到实际应用是一个很长的链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种角色都不可缺少。只是科技人员在这个系统里踟躇,难以出现像样的大规模推广的技术成果。

## ■摄手作

# 简出

(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福邻 李娟摄



# 清代宫廷防治天花的多样“隔离法”

## ■博览荟

周乾

面对时下的疫情,全民采取了隔离的方法,即减少外出,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切断传染病的传播。我国古代中医把传染性统称为“瘟疫”,认为瘟疫发生时隔离病人,可控制传染源,因而自古以来就有隔离瘟疫的方法。

如先秦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载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民众如果得了传染病,就需要被隔离到单独的房屋里进行治疗;《晋书》记载晋朝时若官员家里有传染病病人时,官员本人虽然没有病,但百日内不允许进宫;《南朝齐会要·民政》记载,齐时太子长懋等曾设立了可以收隔病患的医疗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者;北宋医学著作《太平圣惠方》记载当瘟疫进入百姓家庭时,需要开窗通风,这样不会传染等。

清朝是我国天花流行最猖獗的时期。天花又名痘疹、痘疮,是最古老的疾病之一,传染性很强,病死率也很高,它同鼠疫、霍乱、伤寒一样曾严重威胁着古人的健康与生命。当时的紫禁城里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其中主要措施之一就是隔离,即通过避痘、查痘、在热河(承德)建造避暑山庄、设立围班制度等方法,来达到防治天花的效果。

避痘是清初帝王隔离天花的主要方法。据清代史书《北游录》记载,1644年清入关后,由于京城天花流行,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凡是有关天花病人的地方,周围八十步都要用绳子围起来,其他人不得入内。据史料《东华录》记载,顺治二年(1645)曾规定对天花患者进行隔离,要求在京城

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指定一村,作为京城里出痘者隔离的集中地,以防疫情蔓延。顺治帝本人则采取停止大规模朝会或出宫暂停留宿的避痘方法。如《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帝某次寿辰时,由于京城天花流行,因而下令免去了朝贺礼;又如《北游录》记载,顺治十二年十一月,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即孝惠后出痘,顺治帝便急往南海子“避痘”,并下令宫中每天去送碳的人,无论男女,只要没出过痘的,都应该在五丈外止步。

康熙帝刚出生时,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孙氏抱出紫禁城,进入北长街北口的福佑寺隔离。偏偏两岁那年,他仍然没有躲过天花的侵害,在多方悉心照料下,所幸保住了性命。康熙帝搬回了紫禁城后,天花的阴影仍时时笼罩在他的周围。据清代官书《国朝宫史》记载,康熙十三年他曾下令,宫中太监及宫中行走等人,如果家中有患天花的病人,治好的在家待一个月,尚在治疗的须在家住百天,然后才能进宫。避痘法虽然简单,但效果良好。

为有效隔离天花,清代宫廷设立了查痘官员职位,即查痘章京。当时天花病人几乎每年都有,宫廷规定的查痘的对象从八旗军民扩及京城住民、出洋贸易者,以及来京外藩。查痘章京一旦发现症状,即进行隔离,要求患痘民众远离都城,或谕令未出痘外藩不能来京;对于隐瞒不报的,还将从严惩处。据清代史料《癸巳存稿》卷九记载,查痘章京专职负责八旗及京城居民的天花检查,凡是发现得天花的病人,一律要求迁移单独的场所;在皇城外对宗室王公、公主郡主之家采取隔离性保护措施,即上述住宅一定范围内不允许天花病人进入;负责管理蒙古王公的进京事项,只有出过痘(得过天花且产生了抗体)的官员才能进京。

位于承德地区的避暑山庄(热河行宫)是清代皇家园林,但是其建造的初衷却是与隔离天花有关。康熙帝于十六年在热河巡查时,突然发现这里不仅是连接京城和蒙古高原的咽喉之地,而且有利于隔离天花病毒,自然气候条件还适合于避暑、休憩,因而下令建造一座行宫,这就是避暑山庄的由来。清代皇帝每年5月来到山庄,10月前后返回京城,在这里围猎、召见群臣、批阅奏章,接见未出过痘的蒙、回、维等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及开展其他政治活动,驻蹕近半年之久。

康熙帝在热河除了建造避暑山庄,还采取了相应的围班制度,以利于未出痘的蒙古各旗首领参与其主持的政治活动。所谓“围班”,就是皇帝每年秋天在热河举行围猎时,边区蒙古及西北民族部落首领分批觐见皇帝,并参与皇帝主持的围猎、宴席等活动。

位于热河的西北部的木兰地区,面积近万平方公里,这里林深菁密,水草茂盛,是极好的狩猎之地。围班制度是年班制度

的补充形式。根据清朝制度,蒙古各旗王公每年年末都要进京觐见皇帝,在京城停留40余天,称为年班。期间,他们向皇帝献上贡品,皇帝也会回赏礼物,设宴招待他们,举办各种欢庆活动,并了解各旗政务,以加强对蒙古各旗的管理。

清初京城天花流行之时,为避免天花传染,皇帝下令凡是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得年底来京朝勤,但可以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木兰围猎,皇帝也可借此机会接见他们,并给与各种赏赐及娱乐性招待。此时热河秋高气爽,地广人稀,可以较为有效地避免天花传染。

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条件,清代宫廷采取的上述隔离天花病毒的措施有着不完善的方面,但是对于防止瘟疫的蔓延、正常开展各项活动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认为,上述隔离法是我国传统中医防疫理念的应用方式之一,亦能体现我国古人的智慧。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避暑山庄 周乾摄